

唐宋詩醇

上卷

乾隆欽定 御選 御評



中国三峡出版社

乾隆钦定·御选·御评

唐宋诗醇

冉 蓐 校点

（上 卷）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醇/乾隆御选.-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6

ISBN7—80099—105—9

I. 唐… II. 乾… III. ①唐诗—作品集—中国②古体诗—作品集—中国—两宋时代 IV. I22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6707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 1 号 邮政编码:100038)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75

字数:950 千字 印数:3001—6000

定价:49.80 元

选本的沧桑

冉云飞

眼下对于祖制，“慎终”倒未必坚持，但“追远”在某些环节似乎还是挺热衷的。自然，倘使我们推溯选本滥觞的历史，其漫长的时间跨度，必定使动辄崇尚时间久远的国人为之振奋，先前不只是阔过，还阔得很呢，同时又会使受文明沾溉既短的夷人叹服咋舌。相传，《诗》（《诗》之被尊为“经”，据宋代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八考订始于汉文帝至汉武帝时，因而本文讨论时只称《诗》而不称“经”。）因孔子的删节而成今日的面目，尽管并不铁定如此，但大多数人并不愿在这个“相传”和原本的事实上纠缠。郑板桥先生认为罄竹难书的文化灭绝行为——烧书，始自孔子删《诗》，好像孔子成了秦始皇间接的师傅；鲁迅先生则说：“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最古的诗选。”（《集外集 选本》）如此算来，选本的历史已达二千年之久，或许一不小心，我们在世界文化史上又捞了个第一也未可知。

《诗》之被删节，“费过乐师的手脚”，自不待言。从逻辑上推论，删节必存在一个汰弃的过程，汰弃必有选择的标准，正因如此，与其说《诗经》是被删节的，不如说是被选出来的。但这样的推断，与后世通常的选本选择和存在方式——即选本是从个人集子（包括单篇文章）或它种选本中选择出来的——不甚相符；而在《诗经》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完整可供参考的母本（包括曾经

存在而亡佚)，所以那些未曾入选《诗》而被汰弃的作品，永无再见的一天（《四库全书》对部分集子的“选择”编纂亦应作如是观），使后世无从辑佚，从这个角度看《诗》的被删节后，与其说它是选本，毋宁说它是“烧书”后的硕果仅存。

既然确定“选”与“非选”的界标并非轻而易举，可见谈选家之学的麻烦。但选本的陵替变迁，可见文化的播扬，时代的运会，明了文学流派的党争及文人们不断变化的嘴脸，进而得出文海易波的一个大概。当今选家的泛滥是势之必然，剪刀、浆糊的手工操作辅以复印机之类现代机器的帮助，各种参差不齐的选本大规模地出笼，参与文化的“过盛”而成为垃圾，使古代选家批删几十载的慢工出细活，彻底变成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可笑举动，由此也能看出当今浮躁虚滑的士风和大众实用的消费趣味。此类选本所选文章的真正目的，尽管被选家“高明”（古选本多有表达选家标准的前言和凡例，今之选本少有，之所以要隐匿起来，大抵是为掩盖为稻粱谋的用心，或者本来就没定准，其情可悯。）地隐匿起来，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它至少能影子式地反映一时的风尚，正系此类选本歪打正着之功，也算得上是如今选本有别于古选本的特殊“贡献”吧。

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从多方面来打破旧有文化束缚的，1917年7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发表了一封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里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重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后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就成为攻击旧文学的常用熟语，而“选学”则独领了一份新文学对它的谩骂。此类攻击是否属实，我们姑置不论，但由此亦可反观“选学”在吾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选政”之肇端，我自认为并不始于孔子之删《诗》，亦不是

所谓汉人编辑之《楚辞》，当然遭新文学狂骂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更是相去千里。其实在《昭明文选》之前尚有今已失传的两部诗文选集，即杜预的《善文》和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是可以看作后世选本的不祧之祖的，惜乎不存原貌，是大可遗憾的一件事。而《昭明文选》作为至今尚存且影响极大的第一部诗文选集，其选择范围、取舍标准已为后世选家在诗文的去取之间定下了可堪师范的一些规则，它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且史书亦只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共收七百余首，区为三十八类，已非常自觉地注意文学与其它类型著作的区别。其选择标准大抵比较注意文章的骈俪、华藻，是研究梁以前文学重要的参考资料，因之注家纷起而合称“六臣注”，而其所选诗歌因其大多系五古（包括有人从风格和形式上学习“文选”中的诗作），故尔被后世有的人称为“选体”。关于“选体”代有不同意见，如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而清代翁方纲在《格调论》里亦说：“《文选》自汉魏讫齐梁，非一体也，而概目曰‘选体’，可乎？”《文选》之有影响，不只是有“选体”一说供人评说是非，而且在后世形成了一门近乎显学的“文选学”。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就曾有著有《文选评点》一书，在总结前研究“选学”的基础上，其评笺和考证都达到了相当深湛的学术水准，被其师章太炎先生誉为近代“知选学者”。由此亦不难看出《文选》的影响之大概。

《文选》诞生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自觉的时代”略后的齐梁时期，并非空穴来风，实在是时代风尚之必然。这个大时期先后出现的文论名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极其注重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尽管《文选》对作品的取舍并不尽如人意，但其所遵循的对文学作品艺术形式和内容双重并举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才使真正的文学作品从各门类的作品中分离和解放出

来。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倡导更侧重于作品的艺术性，此正是其在《文选·序》里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励”，于此看来，《文选》正是保存了文学从自发到自觉这个过程最真实的资料。

《文选》之后的继出者，当数梁朝著名诗人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收梁以前的诗歌七百六十九首（后人增至八百七十首），大部分系《昭明文选》所未选，而所收的很多诗人的个人集子已佚，颇有存佚之功。但由于后世病其文章的绮靡，而致其所选之书亦遭不公的对待，迟至清朝康熙年间才由吴兆宜作注，他在《笺注序》里说《玉台新咏》“与《文选》并传，而惜乎无之注者，缘其使事命句，大率多出汉魏以上之书，而书不易观”。其实《玉台新咏》是徐陵对其早年所提倡的绮靡之风的一次修正，刘肃的《大唐新语》曾载：“梁简文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则此书之编，盖慨夫当时作风之颓下而欲有所纠正之。”以至《四库全书提要》也不得不为其辩解：“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当然徐陵和梁简文救弊的成果肯定是不大好的，诚如黄云楣在《玉台新咏·引言》里说：“然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风习所趋，流衍漫瀚，一二人推之而有余，千万人挽之而不足。简文、孝穆推之于前，而复欲挽之于后，斯亦昧于顺逆之势矣。安在其能药当时淫艳之病乎？”是标的方来、洞幽烛微的高见。倘使前代人早早看到《玉台新咏》对过往绮靡艳词的救弊之心，并尽快着手整理有关资料，纵有吴兆宜所说的“书不易观”的烦难，恐怕也远比相距千年的后人要切近诗歌本事得多。由此也看出选本之不同命运，进而知晓选本传与不传、彰显或是幽微，不仅关时代运会，而且与注家对其注释的深湛绵密、选家自己从事的文学活动及其威望，都极有瓜葛。

随着时代的推移，各种著作和文献的大批出现，可选的文学作品种类越来越丰富，选家代有人出。后蜀有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宋初有李昉等奉敕编撰并由苏易简等续修的，最终由南宋

嘉泰间周必大于吉州刻印的《文苑英华》。宋代的姚铉又于《文苑英华》的基础上辑成了《唐文粹》，诗则有沈德潜编的《唐诗别裁集》。自此后，每一朝便有相应的诗文选集面世，如南宋的吕祖谦仿《昭明文选》体例，编选了有北宋时期的诗文选《宋文鉴》，南宋时期的诗文选集《南宋文苑》则由清人庄仲方选编而成，诗则有张景星等编有《宋诗别裁集》；明人臧晋叔编的《元曲选》；明人的诗文选集《明文衡》则是由程敏政编选而成，诗则有沈德潜、周準编选的《明诗别裁集》；至清代则有沈德潜编选的《清诗别裁集》和王文濡等编选的《国朝文汇》和《续古文观止》等。我们只要参看一个时期一些重要的选本，便可以对那时的文化风尚有一相当的了解，并且可以对文学流变清理一个相当的轮廓思路。

二

一般说来，选家们多半是胸中自有月旦人物、衡文评人的方略，其差别只在到底是为了藏之名山、传诸后世，还是作蒙童村塾读物，或者干脆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那样纯粹是为了迎合士子考举业的需要，选刻“历科墨卷”，士子们在此获得进学的“终南捷径”。而像马二先生们则是在从中得到活命的利益，以疗自己困于场屋后的贫寒，而出版家（类同今之书商）则从中赚取了数十倍于他的利益。这就是在科举考试越来越程式化的现实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于古代选本的一种变化或偏离。

马二先生这样漫无标准的“‘处片’式”（鲁迅语）的选家在八股盛行时的明清，必定是不少的。八股制义文章由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四年（1074年）倡立，“以经取士”，至明成化功令八股程式，故尔人称八股文“美备于明”，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称赞明成化年间的四书文大家王鏊的制义文章是“无所不包”，可见八股文“美备于明”一说不之谬。而八股文选家虽代不乏人，大多确如马二先生之吃“处片”，完全无衡文之

准星。而较为著名的则有清代的方苞《钦定四书文》和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以及今人田启霖编著的《八股文观止》。其实在八股文盛行之前，宋代已出现了一批泽被后世的著名的蒙童读物如《三字经》等，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刘克庄和谢枋得编选的《千家诗》以及后来的《神童诗》等通俗的选本，这与宋元明时期私学的社会化、蒙学化是不无关系的。耐德翁在《都城纪胜》中说宋代，“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到了清代，私学村塾的发展更加迅速，因此选本中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种朝通俗蒙童读物转化的倾向，较著名的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等。如《古文观止》的选择标准是兼具种种文体，而裁汰孤僻晦拗，文不求高而便于初学者口沫手舐，于清一代的语文读物里鲜有胜过它的，其原因大抵也就在这里。

这些通俗的选本不只是给蒙童增加知识，获得读书必要的门径，而且有的见解亦颇为高妙不俗。如被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先生赞赏的《而庵说唐诗》，“在明清时的选本，此书要算是为初学较好的一种读本了”，“当我尚在幼年，十四岁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就得到了这部书。虽然我当时童痴无知，却由于这部书说诗的浅显，读了之后，使我粗能了解诗中的意味，对于以后读唐诗很有启发。”（《瓜蒂庵文集》）恕我腹俭，此前我是不曾听说过徐增编选的《而庵说唐诗》的。可是事有凑巧，在读了谢先生的介绍性文章后，居然不久前于二仙庵文物市场搜到一册徐增《而庵说唐诗》的石印残本卷四，只是书名已易为《唐诗白话解读本》。虽不知是什么时候，哪个书局对康熙本的翻刻，但揣度它是清末民初的本子是不差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书贾才用“白话”招数蛊惑号召，以求销势的猛增，而获取更大的利益。览此残本，知谢先生所言不谬，如杜甫的“带甲满天地，何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向孤城……”（《送远》）徐增“解”道：“‘带甲满

天地’，此何日也？只该在家，而却远行，真何为也？至亲密友，留他不住，劝它不听，恐其不得回来，各为一哭。而行者不顾，鞍马竟向孤城而去，此是从不曾出去的人，不知在外之苦。”此等有味大白话，难怪能如此截获蒙童的喜爱！徐增作为明崇祯朝的秀才，是钱谦益的门人，又与金圣叹、周亮工、郑超宗、归庄、黎遂球等人过从甚密，国变后，朋友凋零，他以倔强的明遗民而终后半生。他这本编了三十年的《而庵说唐诗》，显然与那种只知赚钱的蒙童读物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他的解释才会如此快人心智，而又隽永深长。

由于明清商业的勃兴，刻书业和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市民文化的需要，致使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劝善书和尺牍、对联（包括春联）、年画等都成了选家们注意的对象，也是出版商生意经的一个来源。如清代刘体恕汇集、朱珪择钞、甘雨施增辑，四川总督道光年间徐泽醇刊行的《文昌帝君全书》二十八卷（其实只是个选本，为了商业利益或便于推广而称《全书》，今人袁啸波编选的《民间劝善书》的选本里未曾提到），《古今尺牍大观》等。这些通俗的选本有非常广大的市场，因而选本亦层出不穷，如民间劝善书的选本，其流通量几与四书五经相埒，可见其影响之广泛。通俗的选本或蒙童选本之所以广为流传，固然有一个需求众多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则是，它没有那些名家或流派选本的藩篱。如姚鼐选古文，则讲究桐城派的“义法”，而对晚明的公安、竟陵派一概排斥；李于鳞选诗注重高华古美的盛唐风格，而对其它风格则予轻视。而像《古文观止》这类通俗选本则不存在上述两种名家选本的弊端，基本上做到以文而选，而非以人来选，不存在流派之别，只在于文章的好坏、高下之分。这就是许多流行甚广的选本并非名家选本而成为“名选”的原因，直可见出选本生命力的真正来源。

三

通俗选本之外的名家选本，文人们也是乐意去做的，但他们的选本多半是藩篱区隔的产物。明清时的文人如李渔、袁枚等人所做的诗文选大都带有派别的意味，间或亦有互相抬举和做交易的情况，亦收入自己弟子的作品，这就很有点类似于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流派，一般都有自己的宣言主张、拥有一个固定的书局、并且编选自己帮派团伙的诗文选集。一九三三年章克标在初版的《文坛登龙术》里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由此可窥看出文人的党派与选家的面貌：

文人的党派，就是书店的党派，只看鲁迅、许钦文和语丝派的一群人，只在北新书局出版书册，在北新出版及发行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胡适之徐志摩等等，总脱不了新月书店；民族主义一派的人，便聚集在现代书店的门口；文学研究会的别一支流，夏丏尊，叶绍钧，茅盾，占领着开明书店；光华书局又是别一种办法，收罗各党派的残兵溃卒。

文坛上党同伐异、谩骂打战的现象，直接反映到选家尤其是名家名选身上更是如此。“竟陵诗派”的盟主钟惺在《诗归序》里言其选诗标准时曾说：“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其实这种自命客观的、以古人诗歌为指归的标准，像钟惺这样标新立异之人是不大做得到的。他也知道选家的力量，因为一般读者总是想在有限的一部书里最大限度地获得知识和营养，“昭明选古诗，人遂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选哉？”选家之力使诗歌原来的名与实俱亡，此虽极言之，但实在是伤心悟道之语。不过钟惺亦不能免除这种过错，因为他的选本并

非客观公正地反应了文学发展的过程。

诗歌流派和选家的变化，与历史不断的迁衍相同，此正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惜也”，竟陵派诗歌在明末均纸贵一时，几令家置一编，风行海内。但在钟惺死后不久，其同年好友钱谦益则丑诋其作品为“鬼趣”、“诗妖”；张岱在批评其八弟毅儒选明诗毫无定准时曾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又与毅儒八弟》）在同一位选家身上，竟然有如此不同的选择标准，可见要秉乎公心而“操选政”，其嘎嘎乎难哉！当然我们也就不难理会主“格调说”的大选家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就明显地偏袒前后七子，而鄙视公安、竟陵派的作品，未收竟陵派代表人物的诗作的用心。这种偏袒固然有流派纷争的原因，但也有大的原因便是清朝入主中原，倡导理学，文网酷密，大张温柔敦厚的诗教，故尔沈德潜标“怨而不怒”，“和平渊雅”，其选诗标准便是：“始端宗旨，继审规格，终流神韵”（其《唐诗别裁》和《清诗别裁》的选择标准亦几类此），胸中雄踞着这样的标准，公安、竟陵得不到真实的评价便不令人奇怪。故尔如沈德潜这类流派型的选家，谬托知己，师心自用，矫曲人心，自是不免的。但此种流弊所存在的武断，会使读者不明事实的原委真相，混乱面目，而读者欲以选本知文学发展之大概，亦有难度，确有难逃“选学妖孽”之讥的可能。

尽管沈德潜写诗和编诗名动朝野，但他场屋蹭蹬，至晚年才被乾隆皇帝看中而成为他的“秘书”，于老年之境中了进士，乾隆亲切地呼为“江南老诗翁”、“朕之诗友”，固然其主要原因是他能代乾隆写很多“亲洒宸翰”的诗，为乾隆作“十全老人”立了一功。但其选诗标准深得统治者乾隆的喜爱，与《唐宋诗醇》和《唐宋文醇》的选择标准真有如出一辙之感，间或有所不同，也是异曲而同工。当然在诗中倡导理学，走得更远的既不是“朕之诗

友”，也不是“十全老人”，却是名气远不及二位大的一位不大相干的人汪薇，在康熙年间所辑选的《诗伦》，他在“凡例”里说：“诗非言伦，体非乐府，无论岁月远近，不敢滥收”，而理学家张伯行在为之作序时，更加露骨地说：“孰谓诗之作，非以明伦？而伦之外又别有诗乎？”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清代，有这样的“诗选”表率在前，怎么会对后面的选家没有号召作用呢？

《唐宋文醇》的“凡例”里已表明这本书虽不全是采于储欣的《唐宋十大家类选》，但也可部分地称为选本的选本。但此书亦有“创制”，即只存乾隆皇帝自己的“评”，因为，“文之短长、抑扬高下及起伏照应，本无定法，所谓天机至，则律吕自调耳。古今人评此者并不录，恐印定后人眼目也。”（《凡例》）乾隆这话说得本也不错，文无定法，不能拿区区之“法”来束缚做文章的大视野。但“古今人评此者并不录，恐印定后人眼目也”，而只留下自己的“御评”，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怕古今人“评”得不够“温柔敦厚”，有思想独断而不相信“臣民”分辨力的深层理由。所以还不如《唐宋诗醇》的“凡例”所言为当，即“旧时评语考证有错谬者，例应删去。特恐沿袭既久，或谓是编偶不及载，而终不识其非，转致遗误无已，故仍录之而加驳正焉。”当然，乾隆的“御评”和欣赏眼光还是不低的，如常人总是非议韩愈《毛颖传》的怪异，而乾隆则说：“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独咕咕然动其喙。亦劳甚矣乎！”不愧是皇帝，“亦劳甚矣乎”这样的重话也是脱口而出的，使人在重压之下无可辩驳，何况他还说得有几分在理呢？

当然《唐宋文醇》的出现亦不是空穴来风，唐宋古文运动对吾国散文发展是深远而广大的，故尔朱右于元末明初曾辑了韩、柳、欧阳、三苏、曾、王的文章而成《八先生集》，可以被认定为是唐宋八大家最早的一个选本；后来在明朝复古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唐顺之有关唐宋八大家的选本《文编》，至茅坤才实有“唐宋八大家”之名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最终由储欣的《唐宋十大家

类选》而发展成为《唐宋文醇》。不过《唐宋文醇》既是“御选御批”，则必然有皇帝的教化在里面，这些言语于统治是有作用的，但似乎不关文学的事；而一些畅所欲言的“御评”，如他赞赏韩愈的《毛颖传》，却并非提倡手下的文士去学韩愈作文的讥刺，否则你就会被他这种“激赏”的文章所误，进而误入他“请君入瓮”之法。如此说来，似乎左右不可，那么此书是不是就不值得一读呢？否！相反，所有的文士都应该备置一部，认真学习，才能略略知晓生活于其治下的“天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便在其中寻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把钥匙。鲁迅研究者江南秀一先生曾在《鲁迅祖父的骂人、著作和姨太太》一文里曾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从杭州狱中将一部木板印的《唐宋诗醇》（可能正是光绪二十三年经纶元记翻刻内府本——引者注）寄回家中。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写给樟寿（鲁迅）诸孙的。”其内容是：“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肖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见《书城杂志》1996年第一期）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诸位先生按祖父的训示办了没有，目前尚未发现有力的佐证材料。但在清朝的统治下，读清朝皇帝御批的书是有用的，鲁迅先生的祖父深谙此点。

不过无论是《唐宋诗醇》（只收李、杜、白、韩、苏、陆六人的作品）还是《唐宋文醇》所收作品都过于集中少数几人身上，未足以反映唐宋诗文的真正情况和历史面貌。对此所有补救的是近代学者高步瀛先生的选本《唐宋文举要》和《唐宋诗举要》，且有精洽的注释。但是《唐宋诗醇》和《唐宋文醇》作为清代内府刻本，流传不广，只有清末的一次翻刻，现在我们老百姓能随便读到这两个本子，是那个时候的普通人所不敢想象的幸福。何况《全唐文》、《全唐诗》之类的巨制，殆非寻常细民所能置办。诚如周作人所说：“说到选本往往遇见高明人的白眼，这其实是极应当

的，假如作者有全集行世，学者又愿专攻，那么为甚弃全集而取选本，岂不是自甘墻面么。但是话分两面说，也有些全集不易得，而读者又未必想作专家的，那么选本倒也是有用的东西，可以应付这个需要，各图书馆里固然都有《全唐诗》，即寒斋书架上唐人诗集也有若干部，可是不佞的诗的知识实在还有从《唐诗三百首》来的，此固由懒惰不好学之故，但我自己的经验上诚不敢看轻选本也。”（《读晚明小品选注》）我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讥照录周作人先生这段话，私心也是想让大家对《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如此看待。至于“御批御选”的真实性（只不过没有人像沈德潜那样主动泄密，把代作的“御作”收入自己的集子中，故尔不知真情实况），也不必去作钁钉小儒似的考证，因为对“宸衷独断”还是少说为佳。

1997年2月20—28日子成都

序

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为是选者，则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无诗醇，且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也。文醇之选，就向日书窗校阅所未毕，付张照足成者，兹诗醇之选，则以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时于几暇偶一涉猎，而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夫诗与文岂异道哉？昌黎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经之所传，其以言训后世者，不以文而以诗，岂不以文尚有铺张扬厉之迹，而诗则优游饜飫人人者深？是则有文醇，尤不可无诗醇也。六家品格与时会，所遭各见于本集小序，是编汇成梁诗正等，请示其梗概，故为之总叙如此。

凡 例

唐宋人以诗鸣者，指不胜数；其卓然名家者，犹不减数十人。兹独取六家者，谓惟此足称大家也。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假正自不同。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稀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继苏者有黄，在当日亦几角立争雄。而百世论定，则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其视白苏较逊。退之虽以文为诗，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实能拔奇于李杜之外。务观包含宏大，亦犹唐有乐天。然同骚坛之大将，旗鼓舍此何适矣？

大家全力多于古诗见之，就近体而论，太白便不肯如子美之加意布置；昌黎奇杰之气，尤不耐束缚；东坡才博又似不免轻视，故篇体常近于率；惟白陆于古今体间，庶无偏向耳。意向既殊，多寡亦异，而选诗者之进退，因之正不强为均齐也。

六家诗集中，白陆最大，别择较难，断以风人之义，多取其有为。而作者录之，顾其忧深思远，随处感发。寄兴之作，亦美不胜收。佳处领要，则又芟其复而拔其尤，探得骊珠，固不屑屑于一鳞片甲耳。

李杜名盛而传久，是以评赏家特多。韩白同出唐时，而名不逮；韩之见重，尤后于白，则品论之词，故应递减。苏陆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复不敌，晚出者评语更寥寥矣。多者，择而取之；少者，不容傅会。折衷一定，声价自齐，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淡为妍媸也。

评语悉准唐宋文醇之例，色别书之。但其中有援据正史、杂